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抗战时期遵义的音乐戏剧活动

林茂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义各界民众与全国人民血肉相连,遍布城乡、激励人心的抗战音乐戏剧活动,成为动员民众、凝聚民心、鼓舞斗志的精神武器,激励人们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消息传至遵义后,各界民众群情激愤,奋起抗日。同年9月,遵义的一些中小学音乐教师和部分音乐爱好者成立了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歌咏队”,选出知名进步人士潘名挥担任歌咏队队长,从“华北抗日宣传队”返回家乡的傅邦荣任副队长兼指挥。歌咏队成立后,定期排练并经常在遵义城区最热闹的丁字口、老城大十字演唱抗日歌曲。据当年参与活动的潘名挥、王永康等人后来回忆,当时演唱的曲目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号》《热血歌》《游击队队歌》《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一关》等。

歌咏队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第一次在遵义街头亮相后,人员激增,多时达一百余人。当时,共产党员杨天源、谢树中以及进步人士陈福桐等都参加了歌咏队的领导活动。

歌咏队不仅演出全国流行的抗日歌曲和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如《陕北公学校歌》等,还结合形势、自编歌曲,创作了由陈福桐作词、潘名挥作曲的包含“把敌人赶出国境”内容的《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会歌》。为表达遵义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教师杨友群创作了《贵州省立遵义师范学校校歌》,陈福桐创作了《老城小学校歌》,孟光宇创作了《新城女子小学校歌》,浙大教授应邀创作了《遵义县私立城成中学校歌》等等,这些校歌的歌词都充满了抗日救国豪情。

由杨友群创作的《血的赞礼》《上弦月》《短歌》和潘名挥与陈福桐共同创作的《保卫大武汉》等歌曲,极富鼓动性,在遵义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1939年春,冯玉祥将军带领巡回演出队到遵义演出,冯玉祥和演出队长卢文都希望遵义能把音乐活动开展起来。遵义县委获悉这一信息后,决定成立“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下称“音教会”)。“音教会”成立后,经常在校内外举行抗战歌曲演唱活动,并在城区成功举办了三次大型音乐戏剧演出。1941年,“音教会”组织了600多名儿童列队行走在大街,高唱抗日歌曲。1942年春节,“音教会”编演了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抗日的民歌剧《壮丁》。

同时还排练了《渡黄河》《新年大合唱》《我们的队伍向前走》《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在遵义播音影院连续演出三场,并将全部收入用于买米面等分送给抗日军属,以表慰问。

为使抗日的歌声越唱越高昂,越唱越深入人心,“音教会”把13所小学的歌咏队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儿童歌咏团”。近千名小学生同声高唱激昂奋进的抗战歌曲,不但使小学生们受到了抗日激情的熏陶,还使抗战歌声飘进了万户千家,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效应。

1941年3月1日,以“老城小学”和“老城女小”为主,邀请浙江大学部分教师和学生参加的抗战歌咏大会在“老城小学”礼堂揭幕。歌咏会的节目全部是演唱抗战歌曲,重点是演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全本《黄河大合唱》,担任指挥的是在“老城女小”兼任音乐教师的浙大学生姜光济。据潘名挥后来撰文回忆:“这次歌咏会一共演出三晚,观众持欢迎券入场。百分之八十是中学和小学的学生,也有浙江大学爱好音乐的师生。晚会的节目上半场为演出抗战歌曲,有合唱、齐唱、独唱、对唱等形式,下半场为专门演出《黄河大合唱》。全部节目的钢琴伴奏除我担任一部分外,还特邀了浙江大学的两位女同志(庞增淑和叶楚贞)来担任。歌咏队员们精神饱满,气氛热烈。”这是《黄河大合唱》这部划时代的音乐作品第一次完整地遵义演出。

抗战期间,一些机构和院校纷纷迁来遵义。这些内迁机构和学校的到来,给遵义的抗战歌咏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或成立歌咏队(如浙大成立了“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等),或开音乐会(如浙大教授、音乐家沈思岩在遵义举办个人抗日歌曲音乐会),将遵义的抗战音乐活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抗战时期,遵义的戏剧活动之持久、之丰富、之鼓动人心,同样也是遵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遵义民众教育馆组织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三江好》《新凤阳花鼓》《莲花闹》等抗日剧目。之后,随着内迁机构和学校等人驻遵义,以及一些当时国内知名的戏剧活动家的参与,遵义的抗战戏剧活动持续不断,并成立了不少演剧社。戏剧爱好者们在播音影院、在各自单位的简易礼堂、在街头、在院坝等地演出了不少抗战戏剧。其中演出的话剧最多,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陶铸的《反间谍》,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南归》,沈浮的《重庆二十

四小时》,袁俊的《万世师表》,洪琛改编的《寄生草》。在遵义演出的其他剧目还有《此恨绵绵》《国家至上》《故乡》《塞上风云》等。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中,知名戏剧家熊佛西率由叶子、端木蕻良、张光宇等组成的“西南文化垦殖团”到遵义,并由熊佛西亲自导演,叶子、林微、冷若冰、邱玺四人主演的话剧《寄生草》在播州影剧院演出,“连天客满,轰动山城”。“西南文化垦殖团”在遵义期间,熊佛西、张君川、任德耀、叶子、林微等都为遵义方兴未艾的戏剧活动作过辅导。他们或担任导演、或亲自登台表演,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舞台形象鼓励遵义民众的抗日激情。

遵义的抗战音乐戏剧活动遍布城乡,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有社会各阶层的踊跃参与。一时间,城乡互动,抗战音乐戏剧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省立三中师生组成宣传队,分赴各自家乡所在的场镇乡村,展开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每到一地,他们都高唱抗日歌曲,演出秧歌戏、活报剧,宣讲抗日形势,鼓动乡民不忘国耻、积极支持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夏天,20余名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暑假工作队由遵义去湄潭途中,在三渡关(位于今湄潭新区三渡镇)住了一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乡村作抗日宣传”,少部分人组织街上及附近的小学生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在三渡关这一周,浙大的同学还编了《全家抗日》等小话剧在当地演出。

团溪是遵义的文化之乡,当地外求学的人不少。“卢沟桥事变”后,返乡学生与团溪新民小学的学生在该校校长夏雨屏大力支持下,自筹经费购置道具,在江西会馆内搭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片爱国心》等剧目,深受欢迎,连续演出六场。团溪女子小学校长赵俊英亲自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尹洪福在《忆抗战中的校长赵俊英》一文中写到,赵校长教同学们唱了很多抗战歌曲,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没有什么挂欠,只是有点留恋。学问总是学不完,要在工作中去锻炼。我们的血液沸腾啦,不踏平日寇不会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再见,再见,在前线。”

遵义遍布城乡的抗战音乐戏剧活动不但持久,而且社会各阶层人士都积极参与其中,深受人们的欢迎。

三

遵义历史悠久,开埠较早。独特的人文地理因素,使遵义的抗战音乐戏剧活动始终呈现出“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交相辉映的情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义音乐戏剧活动的组织者为了迅速使大众参与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最初演出的歌曲和戏剧侧重于控诉、揭露、谴责日军侵略罪行方面的内容。演唱的歌曲因通俗易懂、旋律流畅而迅速在民众中流传开来,如《松花江上》《有家归不得》《国难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战戏剧一般是在街头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同样因通俗易懂而深受民众欢迎。

遵义民众素有用花灯、灯词、莲花闹调子、薹秧歌等即兴填词演唱的习俗。抗战时期,遵义的音乐戏剧工作者们用这种贴近民众的形式宣传抗日活动,特别受欢迎。“音教会”对在校儿童则重点教唱和排演一些和他们的年龄相适应的歌曲和戏剧,如《小二放牛郎》《爸爸打东洋》等。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遵义抗战音乐戏剧活动的内容也发生着变化。除了“下里巴人”式的作品常唱常演外,一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阳春白雪”式的作品也陆续在遵义上演。

全本《黄河大合唱》1941年3月在遵义公演,立即引起轰动。《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在延安诞生的一部音乐作品,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抗战时期鼓舞士气的经典之作。由于运用了一些外国的作曲技巧,排演的难度可想而知。“音教会”知难而进,动员各方力量,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排练,便正式公演了。遵义民众对《黄河大合唱》的挚爱,一时传为佳话。

由遵义本土人士编演的歌剧《壮丁》,也是一部艺术水准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品。《壮丁》全剧除序幕外,共分六场。第一场,豺狼进家门;第二场,送郎去当兵;第三场,捷报频传想亲人;第四场,一件寒衣一颗心;第五场,政府发下光荣证;第六场,凯旋归来情更深。该剧形式新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鼓舞了抗战必胜的士气,激励了救亡图存的民心。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遵义民众涌上街头游行狂欢,纷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遵义体育场,由朱石林指挥3000多人高唱《把敌人赶出境》《我们胜利了》等歌曲,蔚为壮观。

遵义故事

仁岸盐号知多少

龙先绪

过去,贵州人的食盐主要来源是四川自流井所产之盐。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巡抚黄廷桂奏请朝廷允可,对盐政进行改革,在川黔边界设置食盐运销口岸:由永宁河往者曰永岸,由合江沿赤水河往者曰仁岸,由綦江往者曰綦岸,由涪陵往者曰涪岸。

永岸主要承担运往贵州黔西北销区的食盐,盐船由泸州纳溪进入永宁河,上溯到叙永永岸,改为陆运,经雪山关、瓢儿井,转运至黔西北各销区;綦岸主要承担运往遵义部分地区的食盐,盐船由长江进入綦江上溯,达遵义府属之桐梓县松坎起岸,一路运往桐梓、绥阳、遵义府城及遵义县北部地区,一路运往真安州(今正安县)的庙堂、安场等地;涪岸,主要运往贵州黔东销区的食盐,盐船由长江涪陵进入乌江上溯,经彭水、酉阳至贵州沿河、思南,再分销至石阡、铜仁、镇远等地;仁岸主要承担运往贵州腹地销区的食盐,盐船由四川合江上溯赤水河,至仁怀县城下游的鲢鱼溪起岸,改由陆运,经崇盘塘、七里坎、旺隆场、小关子,再顺赤水河上行,经葫芦坝(今赤水葫芦市)、猿猴(今赤水元厚)、土城,陆运至郧家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

清乾隆十年(1745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在解决滇黔黔铅运输问题时,对赤水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载商铅的船只可以从上游之天鼓岩起航,直达合江。盐船也因之上行至茅台村,运盐的数量大大增加,超过了永岸、綦岸、涪岸的总和,茅台村成为食盐之集散地。从茅台村起由人工搬运,一路由金沙、黔西至安顺,一路由鸭溪、息烽、修文至省城贵阳盐务街。

仁岸盐运从清乾隆元年后兴起,到清嘉庆、道光时,盐商云集,商号林立。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二十三日,“二郎滩水银沟四川盐茶道分巡成、绵兼水利道林儒晓谕碑”记载有盐号二十四家,但没有具体名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立于茅台村至仁怀县城三百梯的“万古永垂”修路碑,记载有捐款盐号:周源顺号、全仁顺号各捐银乙两;大有号、金盛号、德盛号、吉昌号、三元号,各出钱一百二十文……江茂盛号助钱九十文。此路碑记载共计有二十五家盐号,与二郎滩晓谕碑所记载的二十四家,多出一家,时间相距三年。由此可知,乾隆末期仁岸已有二十五家盐号。

清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重立的水银沟二郎滩晓谕碑载:“依前先年二十四号始立,远年损坏,后续

八号建修:玉崇号、丰盛号、成玉号、成金号、玉金号、世昌号、玉森号、大有号重立。”大有号在前二十五号之内,这次也署名重立,实际只增添了七家盐号,加上前二十五家盐号,共有三十二家盐号。杨恩元为张鸿绩《枯桐阁词》作跋时说:“仁岸居四岸第一,张氏以盐篋起家,在乾、嘉间营业极盛,道、咸时更称富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经过茅台村时作诗:“家惟储酒卖,船只载盐多。”郑珍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茅台村乘船到仁怀厅时,见仁岸盐船络绎不绝的繁荣景象,高兴作诗:“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从这些描述来看,这一时期仁岸有三十多家盐号是合理的。

清咸丰、同治年间,川盐入黔通道受阻,大量盐引滞积,场商与运商生意淡薄,盐号纷纷歇业,仅有协兴隆、义盛隆、永隆裕、永发祥四家盐号勉强运行。到了清同治末年,形成了散商运销川盐局面。

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楨实行盐政改革:官运商销,规定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只能设四家盐号,由四家盐号负责所在岸口的川盐运销。其中仁岸四家盐号为协兴隆、永隆裕、永发祥、义盛隆。仁岸官运总局设于合江县城,并在合江县的枣林桥河岸建立盐仓。1920年,永隆裕、永发祥、

义盛隆三家同时歇业,协兴隆支撑到1925年,后改为兴升恒,到1933年停业。

1912年,四川军阀盐政部长邓孝可进行盐政改革,“推倒官运,破除引岸。”取消川盐的官运,废除“专商引岸”制度。1916年,泸州孙焕荣等人开设茶顺通、大昌荣、新记三家盐号,赤水人向殿卿、商培高等人合伙开办永盛隆盐号,民间称仁岸“新四号”,但到1918年也歇业了。1919年,在仁岸从事盐运的盐商们在竞争、兼并后,剩下财力较为充裕的德顺和、源通、同益、公益、汉臣公、义厚、协兴仁、利记、赵记、隆盛、利如泉等十一家盐号。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资本较小的盐运散商,如:仁康、公记、祥记、祥兴昌、同仁福等。

赤水市博物馆《中华民国时期仁岸盐号建立时间一览表》记载:1927年有:德厚、裕通黔、仁记、全裕、德谦裕、利记、裕兴隆、华昌、永清仁、庆丰十家盐号。1935年有:裕丰、利记、永记、同盛、永盛、仁和、祥盛、厚记、永兴和、德义长、德厚祥、合福永、安泰祥、德谦裕、永泰长、祥记十六家盐号。1940年有利民、大益、利昌三家盐号外,还有盐业零售商二百一十家。又据《古蔺二郎滩风土记》一书载:二郎滩尚有德华隆号、天益号、存金号、太和号、集大成号,建立时间不详。

仁岸盐运自清乾隆年间起,至川黔公路修通,改为汽车运输止,共计二百余年。